

# 如何精准扶贫？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

□ 于晓宇 刘 婷 陈 依 肖一凡<sup>①</sup>

**摘 要：**非正规创业是“金字塔底层”群体缓解贫困、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过往有关非正规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仅将制度作为研究背景，或只检验制度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极少关注创业经验对制度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为了弥补以上空白，本研究结合深度访谈，检验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两类制度因素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先前创业经验对二者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使用来自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四地农民创业者和信贷员的配对数据，发现：①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②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间呈倒U形关系；③先前创业经验调节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和非正规创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从制度理论的视角丰富了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情境研究，同时，对政策制定者精准识别并分类指导扶贫对象、多部门共同制定扶贫政策，及兼顾短期和长期扶贫效果等方面“对症下药”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关键词：**非正规创业；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先前创业经验；制度理论

## 一、引言

非正规创业是指发生在正式制度之外、非正式制度之内的创业活动（Khavul et al., 2009; Pisani & Richardson, 2012），包括街头摊贩、销售“山寨”产品等多种形

<sup>①</sup> 于晓宇，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刘婷、陈依（E-mail: chenyi.jane@vip.126.com）、肖一凡，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创业失败的印象管理策略、幸福感与随后创业决策：社会网络的视角”（717721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创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失败中创业学习的形成机制及对随后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71472119）、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17）、上海高校特聘教授（青年东方学者）岗位计划资助（QD2016015）以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5PJC053）资助。笔者感谢多位匿名评审专家、主编李海洋教授、领域编辑南开大学任兵教授、南开大学杨俊教授等对本文极具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同时感谢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创业与创新副教授孙黎等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式，是“金字塔底层群体”（Bottom of the Pyramid, BoP）<sup>①</sup> 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Williams & Nadin, 2010；于晓宇等，2013；Hallam & Zanella, 2017）。我国 BoP 群体的创业活动有较强的非正规性，但表现欠佳（斯晓夫等，2017）。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扶贫政策<sup>②</sup>，鼓励 BoP 群体通过创业摆脱贫困，但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复杂且多样，这极大增加了精准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难度。哪些制度因素影响非正规创业绩效？对不同类型的创业者而言，这些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不仅对制度理论在非正规创业情境中应用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政策制定者制定精准扶贫政策亦具有重要意义。

过往对非正规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散，其中大多关注个体因素的影响，例如性别（Nordman & Vaillant, 2014）、受教育程度（Siqueira & Bruton, 2010）、贫困程度（London et al., 2014）以及关系网络（Berrou & Combarnous, 2012）等；少数研究探索了诸如行业环境（Siqueira et al., 2014）、技术投入（Siqueira & Bruton, 2010）以及经营时间（Gulyani & Talukdar, 2010）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还有部分研究探索了制度因素的影响，包括创业活动是否登记注册（Williams et al., 2016）、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Gulyani & Talukdar, 2010）等。个体因素研究和内外部环境因素研究为 BoP 创业者、创业企业提供了重要启发，与之相比，制度视角的相关

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开发、实施政策提供了思路，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但既有研究仍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

首先，多数研究仅将制度作为研究背景，较少将制度作为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Peng 等（2008）指出，仅将制度作为背景，很难深入解释绩效的差异，对于游走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模糊地带的非正规创业活动更是如此（Ketchen et al., 2014）。其次，尽管有部分研究探索制度因素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Williams et al., 2016），但极少有研究探索创业者的经验在制度因素与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创业新手（novice entrepreneur，首次创业的创业者）和创业老手（habitual entrepreneur，有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对制度因素的感知及行为方式极为不同（Zhang et al., 2016）。为了弥补这两个研究局限，本文从制度的两个类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出发（North, 1990），识别影响 BoP 群体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制度因素，重点探索 BoP 创业者的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因素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正式制度强调规则、管制与合法性，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等（North, 1990）。制度空隙（institutional voids）是指正式制度以及受到正式制度影响的基础设施等因素的不完善程度（Khanna & Palepu, 1997）。制度空隙是非正规情境的重要特征，对非正规创业活动的

<sup>①</sup> Prahalad 和 Hammond 于 2002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文，提出金字塔底层群体是指发展中国家中未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低收入群体。

<sup>②</sup> 2015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发表的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我们要注重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影响极其重要 (Webb et al., 2015), 但过往有关制度空隙与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多数研究发现制度空隙对创业绩效有负向影响, 如 Webb 等 (2015) 在研究 BoP 市场中的家族企业时发现, 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制度空隙提高了创业过程中的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Puffer 等 (2010) 发现司法领域的制度空隙导致创业者的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削弱了创业动机, 降低了创业绩效。但也有研究发现制度空隙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如 Mair 和 Marti (2009) 在对孟加拉国 (Bangladesh) 乡村的案例研究中发现, 制度空隙为制度创业者提供创业机会。制度空隙和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忽视非正规创业与正规创业活动的差异, 因此本文首先检验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指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和行为基准, 诸如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族制度等均是正式制度 (North, 1990)。家庭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 家庭成员因其经历过相同的社会化过程, 成员间共同的规范与价值观会对创业者及创业过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Aldrich & Cliff, 2003; Leaptrott, 2005; Arregle et al., 2013; Gras & Nason, 2015)。对非正规创业活动而言, 创业与家庭更是密不可分的。家庭成员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干涉创业活动, 这种情况被称为家庭嵌入 (family embeddedness) (Aldrich & Cliff, 2003)。家庭嵌入对 BoP 群体的创业活动有重要影响, 过往关于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未得到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 家庭成员能为创业者带来廉价甚至免费的资源, 有助于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

(Sanders & Nee, 1996); 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会干涉创业者决策 (Au & Kwan, 2009; Webb et al., 2013; Yu et al., 2017)、侵吞创业资源 (Khavul et al., 2009), 进而磨损非正规创业绩效。因此, 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很可能同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非正规创业绩效。基于此, 本文将探索并检验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间的倒 U 形关系。

此外, 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两类制度因素与非正规创业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在于低估了创业经验的重要作用 (Mcmillan & Woodruff, 2002; Petrova, 2016)。BoP 创业者普遍缺乏正规教育和培训 (Tipple, 2005; Siqueira & Bruton, 2010), 也很少有机会从他人 (如创业模范) 的创业行动中学习 (Thornton & Thompson, 2001; Lafuente et al., 2007), 很难间接学习以获得相关知识; 此外, 尽管部分 BoP 群体有打工经历, 但多数是技术含量低的重复性劳动, 很难积累创业知识 (娄英英等, 2007), 因此创业是 BoP 群体积累知识和资源的主要方式, 这也决定了创业新手和创业老手对创业知识和创业过程的熟悉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Farmer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3), 这些差异决定了创业新手、创业老手对制度空隙和家庭嵌入有不同的利用效果、依赖程度。基于此, 本文将检验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择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民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BoP 群体主要分布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他们的创业活动有极强的非正规性

(Porta & Shleifer, 2011)。欠发达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空隙 (Peng & Luo, 2000; 黄洁等, 2010), 更适于检验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此外, 与城市相比, 中国农村更重视家庭 (费孝通, 1985), 家庭成员通常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创业活动并发挥作用, 选择农民创业者亦有利于观察家庭嵌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来自农民创业者和信贷员的配对数据, 检验了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先前创业经验与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关系模型。本文潜在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识别、检验了制度因素对 BoP 群体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 包括线性和非线性两类直接影响; 二是检验了先前创业经验的调节作用, 拓展了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作用情境。

## 二、案例研究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 在实证研究之前, 本文首先采用多案例研究挖掘研究问题及问题背后的作用机制, 为后续理论模型构建提供坚实基础 (Yin, 2009)。本文首先通过案例研究进行初步探索, 对 17 位典型的 BoP 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 (一) 访谈对象选取

本文关注的是非正规创业过程中的制度因素、经验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访者的选取以符合研究情境、适合探究研究问题为依据, 具体如下:

(1) 创业活动的非正规性。BoP 创业者迫于生计, 通常选择进入门槛较低、产品或渠道不正规的创业活动 (Webb et al., 2009)。本文主要调研通过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sup>①</sup>贷款的女性农户, 她们创业大多为了改善生活, 限于正规创业需要较高的进入成本 (如注册等), 她们多倾向于选择进入成本较低的非正规创业活动 (Mair & Marti, 2009)。

(2) 制度特征的典型性。本文选择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四个省份, 主要由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sup>②</sup>, 经济欠发达、制度不完善等特征突出。

(3) 创业活动的多样性。本文选择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 旨在消除因活动类型单一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结合非正规创业规模较小、进入门槛较低等特征, 本文在零售、餐饮、养殖以及运输等不同行业中选择受访者。

### (二) 访谈过程

本次调研小组由 3 名从事创业研究的人员组成。调研小组通过当地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确定受访者名单, 然后由当地的信贷员带领调研小组成员到受访者家中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本次调研历时 10 天, 共访谈 17 人, 访谈录音文本近 8 万字。最终通过整理、分析访谈文本, 得到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语句 141 句, 具体情况举例如表 1 所示。

### (三) 访谈结果分析

具体而言, 从正式制度来看, 当地正式制

① 分别是: 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宁夏东方惠民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定西市安定区民富鑫荣小额信贷服务中心和赤峰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7),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年版。

度存在不完善的情况，主要体现在：①市场和交易均无人监管，这使非正规创业活动的进入门槛较低，BoP 创业者可选择的创业活动较多；②当地行政监管缺失、执法力度不足，这使 BoP 创业者有可能规避登记、注册等正式制度的监管；③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使 BoP 创业者有可能采用某些方式弥补这些不完善，识别、开发创业机会。

从非正式制度来看，家庭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创业过程中，这表明：①家庭成员会不同程度参与到创业过程中，为 BoP 创业者提供人力、资金、情感等方面的支持；②BoP

创业者认为家人更“爽快”“实诚”，能够“劲儿往一处使”；③BoP 创业者创业收入和家庭支出混用的情况较多，创业者对此习以为常，较少思考收支混用的利弊。

从先前经验来看，先前创业经验对创业者的后续创业存在影响，例如：①受访者 001 曾开过砂锅店、中餐馆，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并学会与人相处；②受访者 208 曾养过羊，掌握了养殖方面的技能，对之后养牛有很大帮助。

访谈结果初步显示，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先前创业经验对非正规创业活动有重要影响，这为后续假设的提出、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

表 1 主要研究概念及具体表现举例<sup>①</sup>

研究概念	界定	具体表现
制度空隙	制度空隙指正式制度不完善，例如法律和规章体系不健全、发展水平较低，或者由于相关政策缺失或实施不到位导致的基础设施等的不完善程度（Khanna & Palepu, 1997; Puffer et al., 2010）	自由市场交易（106：卖羊的集市基本没有统一管，谁想买去买，谁不想买就不去买，自由市场没人管） 行政监管缺失（204：工商局、警察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接触都比较少） 基础设施不完善（201：我们村都是泥巴路，出行不方便，特别是农忙的时候，（村民）要把粮食之类的拖出去卖掉，我就用三轮车帮忙送过去，也赚点钱）
家庭嵌入	家庭嵌入是指家庭成员参与创业活动的程度（Aldrich & Cliff, 2003）	家人参与（206：这个工程队是我和我兄弟一块干的，我侄子也跟我们一块干活） 家庭支持（204：现在开这个店家里人比较支持，平时忙的时候孩子会帮我看店） 家人优势（203：家里人的“劲儿”都往一处使，我们会努力凑些钱买个大的（钻井机），挣的钱会多些，家里支持的话，（我）会更容易做生意） 收支混用（301：做生意的钱和家里的钱没必要分开，因为全是自己的几个亲人）
先前创业经验	先前创业经验是指创业者在创办新企业前有其他创业经历，能够积累创业知识和信息（张玉利和王晓文, 2011）	开过砂锅店（001：之前开砂锅店、中餐馆对这家店有帮助，首先在经营管理方面有经验，也学会怎么和人相处） 养过羊（208：之前养过羊，我也去过工地上干活，给人打小工，养羊麻烦些、难喂些，但学会了怎么养殖，对现在养牛有很多帮助） 养猪（203：之前养过猪，种过地，之前的经历有帮助，家里买钻井机、生活费，都是用我之前养猪赚的钱，也学会怎么做生意了） 卖干货（302：之前在浙江做过生意，卖干货，对养殖有帮助，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非正规创业绩效	与同行的竞争者相比，该创业活动的盈利情况、销售额、增长速度和财务绩效的水平（Robinson, 1999）	慢慢变好（202：养羊的数量肯定是慢慢多起来的，刚开始时对这都不懂行，也不敢养那么多羊，如果赊欠了那就麻烦了，发生瘟疫羊死了那更麻烦，我也是慢慢养起来的。周围有一些人看我养羊养得好，也学我开始养羊） 赚钱（203：没有考虑转行或者干其他的，也是因为开钻井机还是赚钱的）

<sup>①</sup> 全部语句可以向笔者索取。

### 三、假设开发

#### (一) 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

制度空隙指正式制度不完善 (Puffer et al., 2010), 例如法律和规章体系不健全、发展水平较低, 或者由于相关政策缺失或实施不到位导致的基础设施等因素的不完善程度 (Khanna & Palepu, 1997)。多数研究认为, 制度空隙导致市场失效、束缚市场发展 (Leff, 1978; Khanna & Palepu, 2000)、阻碍市场参与 (Mair & Marti, 2009), 因此提高了交易成本, 进而降低了创业绩效 (Puffer et al., 2010)。然而, 这些研究没有区分正规创业活动与非正规创业活动的差异。对正规创业活动起到阻碍作用的制度空隙, 在很大程度上为非正规创业活动创造了机会空间 (opportunity space) (Mair & Marti, 2009)。

非正规创业活动主要分为三类 (Webb et al., 2009): 第一类是渠道合法、产品非法 (illegal) 但正当 (legitimate), 例如通过合法渠道销售“山寨品”; 第二类是产品合法、渠道非法但正当, 例如“摆地摊”销售合法产品; 第三类是产品和渠道均为非法但正当, 例如私下为村民提供卫生服务或者销售自家养殖但未经检验检疫的牛羊肉。

制度空隙为 BoP 群体提供了非正规创业的机会空间。制度空隙的一个特点是基础设施不完善 (Amaeshi et al., 2016), 例如村里难以接触到自来水、医院等基础设施, 这为 BoP 群体贩卖山寨矿泉水、提供非法但正当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机会。同时, 非正规创业活动多在当地或邻近等贫困地区经营, 这些地区 BoP 群体需要的正是这种

廉价、能够基本满足生存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Viswanathan et al., 2012),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非正规创业活动提供了利润空间。例如受访者 201 说: “我们村都是泥巴路, 出行不方便, 特别是农忙的时候, (村民) 要把粮食之类的拖出去卖掉, 我就用三轮车帮忙送过去, 也赚点钱。”既有研究多认为, 基础设施不完善, 应由政府 (North, 1990) 或商业团体 (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负责完善 (Leff, 1978; Khanna & Palepu, 2000), 但这些研究低估了在地方政府和商业团体都失灵的情况下草根 (grassroots) 创业者在完善基础设施过程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 这些 BoP 创业者也是制度创业者, 他们通过非法但正当的创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础设施缺失造成的不便, 也从中获得了利润。

制度空隙提高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另一个途径是降低了非正规创业的成本。除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外, 制度空隙的另一个特点是法律不完善或执法不严 (Chakrabarty & Bass, 2014), 这使得 BoP 创业者无偿或低成本使用公共资源提供产品成为可能, 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另外, 无论产品非法但正当, 还是渠道非法但正当, BoP 创业者都面临极大的监管成本 (Bromley, 1978), 制度空隙大大降低了逃避监管的成本。

综上, 本文提出:

H1: 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 (二) 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

家庭嵌入指家庭成员参与创业活动的程度 (Aldrich & Cliff, 2003)。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同时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例如受访者 102 说, “养羊家里人全都来帮我干活, 想办

法筹钱”，但同时表示，“今年除了养羊也养了牛，儿媳妇到现在还有些说法，说这个牛挣不到钱还要还利息，不太支持我贷款养牛”；受访者 203 说，“家里支持大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块干活，儿子开钻井机，我和他爸联系生意”，但也表示，“做生意的钱和家里的钱不分开，基本放在一块用，哪里需要哪里用，不过家里的支出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家庭嵌入一方面为创业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给创业造成困扰。我们推测，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

当家庭嵌入水平较低时，非正规创业绩效随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而提升。家庭能为 BoP 创业者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资源，帮助他们克服资源短缺、劳动力不足等困难 (Hite & Hesterly, 2001)。家庭嵌入水平越高，表明家庭成员认同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愿意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免费的劳动力等关键支持 (Luo, 2011)，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非正规创业的运营成本，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

当家庭嵌入水平达到某一阈值后，非正规创业绩效随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首先，过高的家庭嵌入导致家庭成员侵蚀创业资源，进而降低创业绩效。过多的家庭成员参与创业活动，往往以家庭的名义对创业成果的分配提出更高的诉求，要求创业收入归家庭所有 (Khavul et al., 2009)。创业者出于互惠、“家和万事兴”等诸多考虑，将较高比例的创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或分配给家庭成员，而不是将创业收入作为资源用于扩大规模等经营活动 (于晓宇等, 2018)，这不仅摊薄了利润，也限制了非正规创业活动的扩大和成长。其次，过高的家庭嵌入导致创业者可获

得的信息和知识同质化较高 (黄洁和买忆媛, 2011)。家庭成员的经历和背景相似，家庭嵌入水平过高，创业者难以从家庭成员处获取新的信息以识别、开发创业机会，也难以从家庭成员处获取不同的知识以创造性地利用资源 (Alesina & Giuliano, 2011; Gras & Nason, 2015)，导致非正规创业陷入过度惯例化 (overroutinization)，丧失了非正规创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来自印度海德拉巴 (Hyderabad) 104 个贫民窟创业活动的经验证据也表明，过度惯例化对非正规创业有致命伤害 (Gras & Nason, 2015)。

综上，本文提出：

H2：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呈倒 U 形关系，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

### (三) 先前创业经验的调节作用

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能否发现隐藏在制度空隙中的创业机会 (Webb et al., 2013)。先前创业经验是 BoP 创业者积累知识和人脉的重要来源 (Sarasvathy et al., 2013)，决定了创业者对隐藏在制度空隙中的创业机会的敏感性，因此调节了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创业新手相比，创业老手更能识别、开发隐匿在制度空隙中的创业机会。根据通道理论 (corridor principle) (Ronstadt, 1988)，创业老手经历过机会识别、开发过程，积累了做生意的“门道”等，因此会对制度空隙中存在的机会信息更敏感 (张玉利等, 2008; Ucbasaran et al., 2009)。此外，创业老手能够更快地对制度空隙中存在的创业机会做出反应 (Li et al., 2014)，利用先前积累的资源 and 知识，先于他人开发创业机会，提高

非正规创业绩效。

综上，本文提出：

H3：先前创业经验正向调节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创业新手往往缺乏生意人脉，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Westhead et al.，2005）。对于创业新手来说，当家庭嵌入水平较低时，非正规创业绩效随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而提升。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为创业新手带来更多廉价的资源和信息，弥补其在经验和判断上的不足（Hite & Hesterly，2001），促进非正规创业绩效。然而，当家庭嵌入水平达到某一阈值后，家庭嵌入在资源、信息、情感支持等方面带来的边际效益降低，随家庭嵌入水平提升而持续增加的是家庭及家庭成员对创业收入决定权、分配权提出的主张和诉求（Khavul et al.，2009）。对于创业新手而言，家庭成员的支持是其创业活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webb et al.，2013），因此创业新手更可能同意将创业所得分配给家庭成员，这不仅降低了创业绩效，也为创业活动的成长设置了天花板。

对于创业老手来说，非正规创业绩效随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创业老手有更丰富的知识和社会网络，能够有效经营非正规创业活动（Westhead & Wright，1998），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在资源、信息、情感支持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依赖。随着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家庭嵌入对创业老手的帮助始终有限，但是家庭嵌入造成的家庭干涉、侵蚀资源等负向影响显著上升，导致非正规创业活动的经营效率降低（Au & Kwan，2009；Webb et al.，2013）。

综上，本文提出：

H4：先前创业经验调节家庭嵌入与非正规

创业绩效间的关系。

H4a：对创业新手而言，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

H4b：对创业老手而言，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负向影响。

结合以上假设，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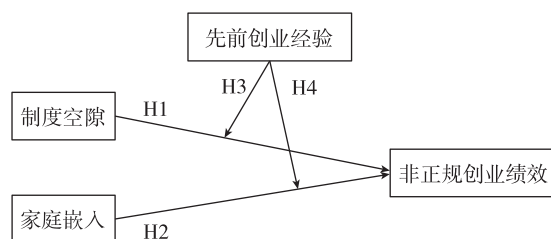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 四、研究方法

### （一）样本和数据

#### 1. 数据收集

本次调研取样在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四地，对曾在这四地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贷款的贫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贫困农户填写问卷的第一部分（1~40题），负责贫困农户贷款事宜的相应信贷员（共39人）填写问卷的第二部分（41~63题）。共发放问卷456份，回收有效问卷390份（有效回收率为85.5%）。我们在实地调研前对多位贫困农户和信贷员进行了预测试，根据预测试的反馈对相关条目的语言表达进行了调整，使其更通俗易懂、更符合农户的实际情况。

本次调研取样在西部地区的四个省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西部地区是精准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区域。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最多，

且开放较晚，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sup>①</sup>。第二，这四地具有成熟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一方面，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提供资金、技术等相关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和就业，会使这四个地区的非正规创业活动较为频繁；另一方面，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的信贷员大多为当地村民，他们对贫困农户的情况十分了解，也能帮助调研人员克服与当地村民间存在的语言（方言）障碍，有利于调研顺利开展。

## 2. 样本概况

样本特征情况如表 2 所示。从受访者来看，女性占比 79.2%，这是因为多数小额信贷组织都有规定，仅向女性提供小额贷款。一是他们相信女性在面对贫困等逆境时更有韧性，有更强烈的通过创业改变贫困命运的动机；二是事实证明女性在还贷方面信用更好（Jain, 1996）。被试主要集中在 36 岁至 45 岁，占比 42.5%，这和其他类型创业者的年龄分布不一样，例如，高科技创业者的年龄集中在 30 岁左右（Zhang & Li, 2010）。农民创业者平均年龄

较大，说明大部分农村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可能有其他谋生的经历，例如 34.4% 的农民创业者有过创业经历。81.2% 的农民创业者没有读过高中，说明了农民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从创业活动来看，创业年限在 2~6 年的最多，占 52.3%。创业活动类型以服务业居多，为 70.5%，摊贩等低成本的服务行业往往是农民创业者的首选，主要因为这类创业活动的进入门槛较低，所需资金、技术较少。雇用员工人数为 1~2 人最多，占 55.4%，有 37.2% 的创业者未雇用员工，只有 7.4% 的创业者雇用员工人数在 3 人及以上，这说明农民创业活动的规模往往很小，较少雇用正式员工，极有可能是家庭成员承担了一部分工作，体现出较强的非正规性。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66.4% 的工作地点在家中。一方面，农民创业者受资金所限，通常占用家庭住所来储存货物，这也给家庭成员对创业成果提出更高分配比例的要求提供了理由；另一方面，在家中可以规避登记、注册或是劳动管理条例等法律强制措施，这也是创业活动非正规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表 2 样本特征统计

样本特征	测量项目	样本量	占比 (%)	样本特征	测量项目	样本量	占比 (%)
性别	男	81	20.8	先前创业经验	无	256	65.6
	女	309	79.2		有	134	34.4
年龄	25 岁及以下	9	2.3	雇用员工人数	0 人	145	37.2
	26~35 岁	102	26.2		1~2 人	216	55.4
	36~45 岁	166	42.5		3 人及以上	29	7.4
	46~55 岁	96	24.6	工作地点	在家工作	259	66.4
	56 岁及以上	17	4.4		有独立的工作场所	131	33.6

<sup>①</sup> 《中国统计年鉴》(2017)。

续表

样本特征	测量项目	样本量	占比 (%)	样本特征	测量项目	样本量	占比 (%)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317	81.2	创业年限	1年及以下	55	14.1
	高中	53	13.6		2~6年	204	52.3
	专科或技校	10	2.6		7~11年	72	18.5
	本科及以上	10	2.6		12年及以上	59	15.1
省份	陕西	95	24.4	创业活动类型	服务业	275	70.5
	宁夏	124	31.8		农牧业	62	15.9
	甘肃	87	22.3		制造业	15	3.9
	内蒙古	84	21.5		其他	38	9.7
合计		390	100	合计		390	100

## (二) 变量和测量

非正规创业绩效。本文采用财务指标 (Robinson, 1999) 来测量非正规创业绩效, 由为农民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员填写, 包括盈利情况、销售额、增长速度和财务绩效 4 个条目, 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形式, 1 表示该创业活动相对于同行竞争对手处于后 20%, 5 表示该创业活动相对于同行竞争对手处于前 20%, 3 表示该创业活动处于同行竞争者的平均水平。

制度空隙。过往有关制度空隙的度量多只关注单个制度 (Chakrabarty, 2009), 但正式制度的很多方面都会对创业过程产生影响。目前尚未有研究结合中国情境开发制度空隙的测量工具, 本文结合非正规情境, 参考过往研究中有关制度空隙的定义及内涵 (Khanna & Palepu, 1997; Khanna et al., 2005; Puffer et al., 2010; Chakrabarty & Bass, 2014; Amaeshi et al., 2016; Gao et al., 2017), 采用 11 个条目测量制度空隙, 由信贷员填写, 主要评估该创业者所在村子能接触到以下各项的程度: ①自来水; ②稳定的电源; ③水泥路/沥青路; ④小学 (30

分钟路程内); ⑤中学 (30 分钟路程内); ⑥银行; ⑦医疗服务; ⑧法院; ⑨所在村子是安全的; ⑩企业受到勒索、盗窃、诈骗等影响; ⑪村里各家的地面是泥地、沙地的程度。1 表示强烈同意, 5 表示强烈不同意, 最后计算 11 个条目的均值, 表示制度空隙。

家庭嵌入。家庭是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 本文采用姓名生成法 (name generator) 收集数据 (Burt, 1992; Arregle et al., 2013), 请创业者填写经常为其提供帮助的 10 个人 (至多 10 人), 并注明是否为家人。通过计算家人人数占所有提供帮助人数的比例, 来代表社会网络中的家庭嵌入 (Renzulli et al., 2000; Webb et al., 2015)。

先前创业经验。本文用“在这个生意之前, 您是否还做过其他的生意”来测量创业者的先前创业经验 (Stuart & Abetti, 1987; 张玉利等, 2008), 并以有无先前创业经验来区分创业老手和创业新手。

控制变量。借鉴过往文献, 本文选取创业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 (Siqueira & Bruton, 2010)、家庭规模 (London et al., 2014)、家庭

年收入、创业年限、雇用员工人数、贷款次数 (Mair & Marti, 2009) 以及是否有独立的工作场所共 8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家庭规模用家庭总人数测量。

### (三) 信度和效度

#### 1. 内部结构检验

由于本文中部分量表是根据研究情境改进, 且首次在中国情境下使用, 因此本文首先评估量表的内部结构。根据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8) 的建议, 本文首先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来检验量表条目与理论预期是否一致, 再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确认量表的内部结构。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删除了制度空隙的量表中的 2 个条目 (因子载荷值小于 0.2)。其次, 为了满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最大似然法的假设, 同时减少参数估计的数量, 提高模型拟合度, 本文采用 Russell 等 (1998) 的方法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sup>①</sup>, 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拟合度很好 ( $\chi^2 = 30.427$ ,  $p = 0.002$ ,  $\chi^2/df = 2.536$ ,  $GFI = 0.979$ ,  $DELTA^2 = 0.985$ ,  $CFI = 0.985$ ,  $TLI = 0.974$ ,  $RSMEA = 0.063$ )。

#### 2. 信度

本文通过检验内部一致性和组合信度评估量表信度。Cronbach 系数是检验内部一致性的重要指标, 本文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高

于阈值 0.7, 同时, 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均高于阈值 0.6 (Hair et al., 2006), 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 3. 效度

本文通过计算平均抽取变异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中观测指标与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来评估聚合效度。如表 3 所示, 所有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阈值 0.5。同时, 所有构念与其观测指标之间的路径系数的 T 值最小为 12.291, 大于阈值 2.0 (Anderson & Gerbing, 1982), 因此聚合效度较好。本文通过计算 AVE 值的平方根来评估区分效度。如表 3 所示,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Fornell & Larcker, 1981), 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 4. 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采用程序控制与统计控制两种方法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控制上, 本调研问卷由农民创业者与为其提供贷款服务的信贷员配套填写。在统计控制上, 本文采用巢状模型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如果共同方法偏差很严重, 那么单因子会解释所有显变量 (Slater et al., 2006)。采用巢状模型比较单因子模型和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 数据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 ( $\chi^2 = 30.427$ ,  $df = 12$ ) 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的拟合度 ( $\chi^2 = 255.735$ ,  $df = 13$ ),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sup>①</sup> 先将制度空隙的 9 个条目进行 EFA, 并强制提取 1 个因子, 再将 9 个条目按因子载荷值大小排序, 并按照每个子包 (parcel) 平均载荷值相等的原则分为 3 个子包, 即因子载荷值排在第 1、第 5 和第 9 的条目合为子包 1, 第 2、第 6 和第 8 的条目合为子包 2, 第 3、第 4 和第 7 的条目合为子包 3, 最后将 3 个子包标准化后进行 CFA。

表3 变量信度、效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条目	因子载荷	T 值
制度空隙 (CA=0.874, CR=0.876, AVE=0.702)		
子包1 (银行、法院、所在村子是安全的)	0.777	17.132
子包2 (中学、稳定的电源、自来水)	0.871	18.835
子包3 (医疗、小学、水泥路或沥青路)	0.862 <sup>a</sup>	
非正规创业绩效 (CA=0.841, CR=0.854, AVE=0.595)		
盈利情况	0.775	12.421
销售额	0.834	12.433
增长速度	0.753	12.291
财务绩效	0.718 <sup>a</sup>	

$\chi^2=30.427$ ,  $p=0.002$ ,  $\chi^2/df=2.536$ ,  $GFI=0.979$ ,  $DELTA^2=0.985$ ,  $CFI=0.985$ ,  
 $TLI=0.974$ ,  $RSMEA=0.063$

注: a. 固定因子载荷值, CA=Cronbach's  $\alpha$ , CR=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 五、分析和结果

### (一) 相关统计分析

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 家庭年收入 ( $r=0.185$ ,  $p<0.001$ )、雇用员工人数 ( $r=0.120$ ,  $p<0.05$ )、贷款次数 ( $r=0.156$ ,  $p<0.01$ )、先前创业经验 ( $r=0.245$ ,  $p<0.001$ ) 均与非正规创业绩效显著相关。本文借鉴 Zhang 和 Rajagopalan (2010) 的研究中消除一次项和其平方项的多重共线性的做法, 用一次项对平方项回归后产生的残差值代替原来的平方项用于数据处理。

数据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临界值 0.7, 且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2。因此, 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 (二)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假设, 结果如表5所示。本文首先对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和

先前创业经验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分别计算标准化之后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与先前创业经验间的两个交互项。模型1检验了控制变量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制度空隙, 检验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 模型3、模型4分别加入家庭嵌入的一次项、平方项, 检验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 模型5加入调节变量先前创业经验, 模型6加入制度空隙与先前创业经验的交互项、家庭嵌入与先前创业经验的交互项, 检验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和非正规创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模型2的结果表示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 $\beta=0.069$ ,  $p<0.1$ ), H1得到验证。模型4的结果表示家庭嵌入的平方项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显著的影响 ( $\beta=-0.134$ ,  $p<0.001$ ), 即, 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H2得到验证。模型6的结果表示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

表 4 相关系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年龄												
2. 受教育程度	0.097 <sup>†</sup>											
3. 家庭规模	-0.060	-0.005										
4. 家庭年收入	-0.110 <sup>*</sup>	0.083	-0.016									
5. 创业年限	0.333 <sup>***</sup>	0.080	-0.039	0.071								
6. 雇员工人数	-0.105 <sup>*</sup>	0.036	0.114 <sup>*</sup>	0.241 <sup>***</sup>	0.018							
7. 贷款次数	-0.027	-0.019	-0.131 <sup>**</sup>	0.217 <sup>***</sup>	0.056	0.145 <sup>**</sup>						
8. 是否有独立的工作场所	0.179 <sup>***</sup>	-0.056	-0.029	-0.091 <sup>†</sup>	0.148 <sup>**</sup>	-0.214 <sup>***</sup>	-0.211 <sup>***</sup>					
9. 制度空隙	0.000	-0.087	-0.039	0.092 <sup>†</sup>	0.110 <sup>*</sup>	-0.111 <sup>*</sup>	0.042	0.127 <sup>*</sup>				
10. 家庭嵌入	0.056	0.027 <sup>†</sup>	0.222 <sup>***</sup>	-0.176 <sup>***</sup>	0.020	0.039	-0.241	0.009	-0.042	0.838		
11. 先前创业经验	-0.009	-0.018	0.128 <sup>*</sup>	0.040	-0.200 <sup>***</sup>	0.117 <sup>*</sup>	0.010 <sup>***</sup>	-0.110 <sup>*</sup>	-0.131 <sup>*</sup>	0.128 <sup>*</sup>		
12. 非正规创业绩效	-0.062	0.057	-0.009	0.185 <sup>***</sup>	-0.140 <sup>**</sup>	0.120 <sup>*</sup>	0.156 <sup>**</sup>	-0.026	0.077	-0.055	0.245 <sup>***</sup>	0.771
均值	40.467	1.269	3.903	10.516	6.688	1.151	4.585	0.664	2.498	0.432	0.354	3.219
标准差	8.327	0.659	1.281	0.870	6.680	1.425	4.458	0.473	0.849	0.122	0.479	0.680

注：\*\*\*代表 p<0.001，\*\*代表 p<0.01，\*代表 p<0.05，†代表 p<0.1，样本量为 390；对角线上数据是相关变量的 AVE 值平方根。

表 5 回归系数表

被解释变量	非正规创业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年龄	-0.008 (0.046)	-0.003 (0.046)	-0.004 (0.046)	-0.015 (0.046)	-0.026 (0.045)	-0.021 (0.044)
受教育程度	0.085 (0.087)	0.100 (0.088)	0.010 (0.088)	0.094 (0.086)	0.103 (0.084)	0.103 (0.083)
家庭规模	-0.023 (0.061)	-0.020 (0.061)	-0.022 (0.062)	-0.014 (0.061)	-0.046 (0.060)	-0.054 (0.059)
家庭年收入	0.124 *** (0.035)	0.123 *** (0.035)	0.123 *** (0.035)	0.126 *** (0.035)	0.109 ** (0.034)	0.113 *** (0.034)
创业年限	-0.099 * (0.040)	-0.108 ** (0.041)	-0.108 ** (0.041)	-0.072 † (0.041)	-0.044 (0.040)	-0.037 (0.040)
雇用员工人数	-0.033 (0.043)	-0.028 (0.043)	-0.028 (0.044)	-0.044 (0.043)	-0.046 (0.042)	-0.050 (0.041)
贷款次数	0.022 ** (0.008)	0.022 ** (0.008)	0.022 ** (0.008)	0.022 ** (0.008)	0.021 * (0.008)	0.021 ** (0.008)
是否有独立的工作场所	0.064 (0.075)	0.049 (0.075)	0.049 (0.075)	0.060 (0.074)	0.080 (0.072)	0.076 (0.071)
解释变量						
制度空隙		0.069 † (0.040)	0.069 † (0.040)	0.075 † (0.040)	0.092 * (0.039)	0.109 ** (0.039)
家庭嵌入			0.048 (0.291)	0.053 (0.286)	-0.111 (0.280)	-0.075 (0.278)
家庭嵌入 <sup>2</sup>				-0.134 *** (0.034)	-0.127 *** (0.033)	-0.106 ** (0.033)
先前创业经验					0.333 *** (0.070)	0.365 *** (0.069)
调节作用						
制度空隙× 先前创业经验						0.092 ** (0.033)
家庭嵌入× 先前创业经验						0.022 (0.033)
家庭嵌入 <sup>2</sup> × 先前创业经验						0.100 ** (0.034)
R <sup>2</sup>	0.072	0.079	0.079	0.116	0.166	0.202
Adjusted R <sup>2</sup>	0.053	0.058	0.055	0.090	0.139	0.170
F 值	3.709 ***	3.639 ***	3.269 ***	4.489 ***	6.243 ***	6.298 ***
ΔF	3.709 ***	2.927 †	0.027	15.445 ***	22.700 ***	5.603 ***
最大 VIF 值	1.215	1.217	1.255	1.255	1.258	1.264

注：表格中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代表 p<0.001，\*\* 代表 p<0.01，\* 代表 p<0.05，† 代表 p<0.1，样本量为 390。

作用 ( $\beta=0.092, p<0.01$ ), H3 得到验证。从图 2 可以看出,对创业老手而言,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先前创业经验对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倒 U 形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 $\beta=0.100, p<0.01$ ), H4 得到验证。从图 3 可以看出,对创业新手而言,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对创业老手而言,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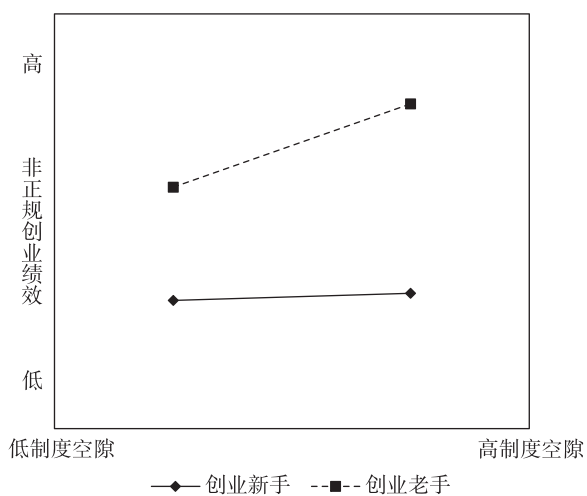


图 2 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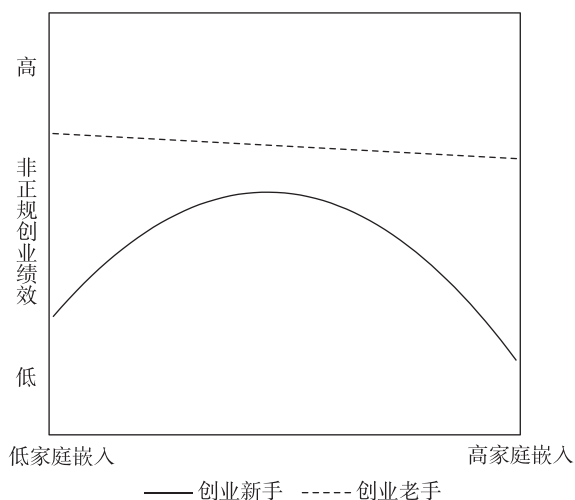


图 3 先前创业经验对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识别并检验了两类重要的制度因素——制度空隙和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重点检验了先前创业经验对两类制度因素与非正规创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②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③先前创业经验对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④先前创业经验对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非正规创业相关理论和实践有重要价值和启发。

### (一)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检验了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为过往有关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过往有关制度空隙与创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大多都是质化研究且较少强调非正规创业活动的特征 (Mair & Marti, 2009; Puffer et al., 2010)。本文设计了中国情境下制度空隙的量表并实证检验制度空隙与非正规创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空隙对非正规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制度空隙为 BoP 群体扩大了发现创业的机会空间,也降低了创业成本,有助于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从短期来看,制度空隙为 BoP 群体在创业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创造了可能 (Gulyani & Talukdar, 2010)。但是从长期看,制度空隙可能为 BoP 群体非正规创业活动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Perry et al., 2010),导致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背离。未来研

究可以结合非正规经济、BoP 群体的特征探索、检验制度空隙对短期、长期非正规创业绩效影响的差异，不仅对制度空隙相关文献做出贡献，也为制定能兼顾短期和长期扶贫效果的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启发。

第二，本文发现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倒 U 形关系，为过往非正规情境下家庭嵌入对创业绩效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整合性的解释。部分研究发现，家庭嵌入对创业绩效有积极影响 (Jack, 2005)，家庭成员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源，降低创业过程中的成本；也有研究发现恰好相反 (Khavul et al., 2009)。本文发现，随着家庭嵌入水平的上升，非正规创业绩效会先上升后下降，即适度的家庭嵌入更有利于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这一发现和家庭嵌入相关的研究形成对话 (Gras & Nason, 2015)，未来可以细化家庭嵌入的类型，进一步完善关于家庭与非正规创业活动关系的解释 (Arregle et al., 2013)。

第三，本文发现先前创业经验在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拓展了制度因素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作用情境。过往有关制度因素与非正规创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极少关注情境变量，更是忽视了创业者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Mcmillan & Woodruff, 2002; Petrova, 2016)。本文发现，作为 BoP 创业者积累创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先前创业经验调节制度空隙、家庭嵌入与非正规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说明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对于创业新手和创业老手有着不同的绩效意

义 (Zhang et al., 2016)，这一发现提醒非正规创业研究应关注创业者的异质性，尤其是创业经验在非正规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探索非正规创业者的异质性及其影响也可以为精准扶贫提供重要启发。

## (二) 实践启示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sup>①</sup>。对于迫于生计选择非正规创业的贫困人口而言，创业几乎是他们收入的全部来源，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的主要手段 (张立冬, 2013)。如何有效地制定精准扶贫政策，帮助 BoP 群体提高非正规创业绩效，使他们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BoP 创业者有如下实践启示：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首先，是否具备创业经验可作为地方政府精准识别、分类指导的重要标准。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难点 (汪三贵和郭子豪, 2015)，我们发现，创业新手和创业老手在制度空隙、家庭嵌入对非正规创业绩效的影响上有差异。这说明，除了家庭收入等指标，是否具备创业经验可以作为识别贫困程度的标准之一。政府可以据此进行分类指导，因人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具体而言，面对创业新手，政府应鼓励其大胆尝试，并向创业老手学习以弥补经验上的不足；鼓励其家庭成员适度参与，帮助其认识到家庭嵌入是一把双刃剑，或者为其提供能替代家庭参与的资源，确保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面对创业

<sup>①</sup>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老手，政府应为其提供多样、丰富的信息与廉价资源，提供多种人力资源的渠道，帮助其摆脱家庭嵌入对创业造成的沉重负担，使一部分创业老手脱贫致富，并最终带领创业新手共同走向富裕。

其次，制定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同时考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文发现，正式、非正式制度均会对非正规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且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精准扶贫需要地方政府在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降低行政壁垒的同时把握好完善制度的节奏和分寸；政府要同时考虑家庭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为有需要的创业者提供多样化的劳动力来源，避免家庭成员过多地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当前，制定精准扶贫政策需要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帮助 BoP 群体通过创业真正实现精准脱贫。

对 BoP 创业者来说，首先，他们可以通过开发制度空隙中的机会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村里没有幼儿园等制度空隙确实提高了一部分创业活动的成本，但也为一部分创业者开办“托班”提供了制度创业的机会（Maguire et al., 2004）。尽管诸如“托班”、销售山寨品等创业活动游走在法律边缘，但这些制度空隙确实增加了 BoP 群体发现创业机会的空间。尽管笔者并不鼓励 BoP 群体“钻空子”去创收，但研究表明这确实是 BoP 群体短期提升非正规创业绩效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制度不断完善，创业者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度约束。他们必须逐步摆脱通过“钻空子”赚钱的方式，实现非正规创业活动向正规创业活动的转型。

其次，BoP 创业者必须重视家庭这一非正式

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将家庭嵌入的水平掌控在适度的范围。在非正规创业过程中，大多数非正规创业活动依赖家人提供的帮助，创业收入与家庭支出没有清晰的界限，BoP 创业者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思考家庭给创业带来的好处和弊端，但家庭嵌入应该引起 BoP 创业者的重视。对 BoP 创业者而言，他们对待家庭成员提供的帮助应该冷静分析，接受家庭成员过多的帮助反而会阻碍创业发展，要掌控好家庭嵌入的水平，在家庭责任与创业发展之间求得平衡。

### （三）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首先，本文在探索先前创业经验的调节效应时，未区分先前创业经验的性质（于晓宇和蔡莉，2013）。过往研究发现，先前成功经验与先前失败经验的作用效果不一样（Ucbasaran et al., 2007）。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对于一些创业者来说，创业失败经历不仅加剧了他们的贫困程度，也加重了他们对失败的恐惧，彻底打消了他们再次创业的意向。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不同性质的先前创业经验对非正规创业活动的影响，揭示非正规创业情境中先前经验的负面作用。

其次，本文在数据收集阶段采用便利取样方法，通过四个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收集数据，四个组织的贷款对象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女性，所以调研样本大部分是女性（79.2%）。过往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非正规创业过程中面对的约束不同，创业行为和结果存在差异（Khavul et al., 2009），未来可探索性别对制度因素和非正规创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

验男女创业者面对相同制度空隙时在机会识别、机会开发等方面的异同，为精准扶贫提供性别维度的理论启发。

再次，尽管我们抽样的四个省份（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是它们在制度环境、非正规创业活动的行业分布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宁夏（样本量为124，占总样本的31.8%）少数民族的创业活动受到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某一省份或者乡镇，降低地区差异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辅以质化研究以更精细刻画制度因素对非正规创业活动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也应“一地一议”，使扶贫政策与地方制度特征匹配，扶贫效果才能精准。

最后，本文未检验制度空隙与家庭嵌入的因果关系，及制度空隙与家庭嵌入的交互效应。一些研究提出制度空隙可能正向促进家庭嵌入（Webb et al., 2015），或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替代效应（Ge et al., 2018）。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两类制度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创业经验的作用，因此没有讨论两类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抽样的地区，检验制度空隙等正式制度与家庭嵌入等非正式制度在非正规创业活动中的交互效应。

（接受编辑：任兵）

收稿日期：2018年3月21日

接受日期：2018年8月29日）

####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

年版。

[2] 黄洁、蔡根女、买忆媛：《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资本和初创企业绩效》，《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

[3] 黄洁、买忆媛：《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类型的预测能力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1年第4期。

[4] 娄英英、钟爱保、陈伟金：《制度创新是推动农民创业的关键》，《求实》，2007年第11期。

[5] 斯晓夫、钟筱彤、罗慧颖、陈卉：《如何通过创业来减少贫穷：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年第6期。

[6]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党政视野》，2016年第7期。

[7] 于晓宇、蔡莉：《失败学习行为、战略决策与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管理科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8] 于晓宇、陈依、张陈健：《创业者的人脉转型》，《清华管理评论》，2018年第1-2期。

[9] 于晓宇、张文宏、桑大伟：《非正规创业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8期。

[10] 张立冬：《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1] 张玉利、王晓文：《先前经验、学习风格与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11年第3期。

[12] 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

[13] Aldrich, H. E., & Cliff, J. E. 2003.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5), 573-596.

[14] Alesina, A., & Giuliano, P. 2011. Family 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 (5), 817–839.

[15] Amaeshi, K., Adegbite, E., & Rajwani, T. 2016.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allenging and non-enabl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s: Do institutional voids matter?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4 (1), 135–153.

[16] Anderson, J.C., & Gerbing, D.W. 1982. Some methods for respecifying measurement models to obtain unidimensional construct measur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 (4), 453–460.

[17] Anderson, J.C., & Gerbing, D.W.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3), 411–423.

[18] Arregle, J.L., Batjargal, B., Hitt, M.A., Webb, J.W., Miller, T., & Tsui, A.S. 2013. Family ties in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9 (2), 313–344.

[19] Au, K., & Kwan, H.K. 2009. Start-up capital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 The role of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3 (4), 889–908.

[20] Berrou, J.P., & Combarnous, F. 2012. The person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in an informal African urban economy: Does the “strength of ties” matter?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70 (1), 1–30.

[21] 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2] Bromley, R. 1978. Organization, regul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so-called “urban informal sector”: The street traders of Cali, Colombia. *World Development*, 6 (9), 1161–1171.

[23] Chakrabarty, S. 2009.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voids on family ownership of large

firms: A country level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5 (1), 32–45.

[24] Chakrabarty, S., & Bass, A.E. 2014. Institutionalizing ethics in institutional voids: Building positive ethical strength to serve women microfinance borrowers in negative context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9 (4), 529–542.

[25] Farmer, S.M., Yao, X., & Kung-Mcintyre, K. 2011. The behavioral impact of entrepreneur identity aspiration and prior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5 (2), 245–273.

[26] Fornell, C., & Larcker, D.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1), 39–50.

[27] Jain, P.S. 1996. Managing credit for the rural poor: Lessons from the Grameen bank. *World Development*, 24 (1), 79–89.

[28] Gao, C., Zuzul, T., Jones, G., & Khanna, T. 2017. Overcoming institutional voids: A reputation-based view of long-run surviv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doi: 10.1002/smj.2649.

[29] Ge, J., Carney, M., & Kellermanns, F. 2018. Who fills institutional voids? Entrepreneurs' uti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family ties in emerging market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doi: 10.1177/1042258718773175.

[30] Gras, D., & Nason, R.S. 2015. Bric by bric: The role of the family household in sustaining a venture in impoverished Indian slum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 (4), 546–563.

[31] Gulyani, S., & Talukdar, D. 2010. Inside informality: The links between poverty, microenterprises,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Nairobi's slums. *World Development*, 38 (12), 1710–1726.

- [32]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 [33] Hallam, C. R. A., & Zanella, G. 2017.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ast experie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26 (2), 1-13.
- [34] Khanna, T., & Palepu, K. 1997. 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5 (4), 41-48.
- [35] Hite, J. M., & Hesterly, W. S. 2001. 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 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3), 275-286.
- [36] Jack, S. L. 2005. The role, use and activation of strong and weak network ti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2 (6), 1233-1259.
- [37] Ketchen, D. J. Jr., Ireland, R. D., & Webb, J. W. 2014.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s editorial boar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8 (1), 95-100.
- [38] Khanna, T., & Palepu, K. 2000. The future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Long-run evidence from Chi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3), 268-285.
- [39] Khanna, T., Palepu, K. G., & Sinha, J. 2005. Strategies that fit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3 (6), 63-76.
- [40] Khavul, S., Bruton, G. D., & Wood, E. 2009. Informal family business in Afric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3 (6), 1219-1238.
- [41] Lafuente, E., Vaillant, Y., & Josep, R. 2007.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role models: Compa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rural Catalonia. *Regional Studies*, 41 (6), 779-796.
- [42] Leaptrott, J. 2005.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view of the family busines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8 (3), 215-228.
- [43] Leff, N. H. 1978.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6 (4), 661-675.
- [44] Li, Y., Vertinsky, I. B., & Li, J. 2014. National distanc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9 (4), 471-489.
- [45] London, T., Esper, H., Grogan - Kaylor, A., & Kistruck, G. M. 2014. Connecting poverty to purchase in informal market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8 (1), 37-55.
- [46] Luo, J. D. 2011. Guanxi revisited: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miliar ties in a Chinese workpl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7 (2), 329-351.
- [47] Maguire, S., Hardy, C., & Lawrence, T. B. 2004.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5), 657-679.
- [48] Mair, J., & Marti, I. 2009. Entrepreneurship in and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 (5), 419-435.
- [49] Mcmillan, J., & Woodruff, C. 2002. The central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3), 153-170.
- [50] Nordman, C. J., & Vaillant, J. 2014. *Inputs, gender roles or sharing norms? Assessing the gender performance gap among informal entrepreneurs in Madagascar*.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8046.
- [51]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2] Peng, M. W. , & Luo, Y.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 – 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3), 486–501.

[53] Peng, M. W. , Wang, D. Y. L. , & Jiang, Y. 2008. An institution – 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5), 920–936.

[54] Perry, G. E. , Maloney, W. F. , Arias, O. S. , Fajnzylber, P. , Mason, A. D. , & Saavedrachanduvi, J. 2010. *Informality: Exit and Exclusion*. The World Bank.

[55] Petrova, K. 2016.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doi: 10.1142/ S1084946716500102.

[56] Pisani, M. J. , & Richardson, C. 2012. Cross – border informal entrepreneurs across the South Texas – Northern Mexico boundary.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4 (3–4), 105–121.

[57] Porta, R. L. , & Shleifer, A. 2011.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Africa*.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6821. doi: 10.3386/w16821.

[58] Prahalad, C. K. , & Hammond, A. 2002. Serving the world's poor, profitabl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0 (9), 48–57.

[59] Puffer, S. M. , Mccarthy, D. J. , & Boisot, M. 2010. Entrepreneurship in Russia and China: The impact of formal institutional void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4 (3), 441–467.

[60] Renzulli, L. A. , Aldrich, H. , & Moody, J. 2000. Family matters: Gender,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 *Social Forces*, 79 (2), 523–546.

[61] Robinson, K. C. 1999.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structure on eight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for high potential independent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4 (2), 165–187.

[62] Ronstadt, R. 1988. The corridor principl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 (1), 31–40.

[63] Russell, D. W. , Kahn, J. H. , Spoth, R. , & Altmaier, E. M. 1998. Analyzing data from experimental studies: A latent var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5 (1), 18–29.

[64] Sanders, J. M. , & Nee, V. 1996. Immigrant self – employment: The family a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2), 231–249.

[65] Sarasvathy, S. D. , Menon, A. R. , & Kuechle, G. 2013. Failing firms and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temporal portfolio.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0 (2), 417–434.

[66] Siqueira, A. C. O. , & Bruton, G. D. 2010. High –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Firm informality and contextualization of resource – based theory.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57 (1), 39–50.

[67] Siqueira, A. C. O. , Webb, J. W. , & Bruton, G. D. 2014.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y condi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40 (1), 177–200.

[68] Slater, S. F. , Olson, E. M. , & Hult, G. T. M. 2006.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on the strategy formation capability –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7 (12), 1221–1231.

[69] Stuart, R. , & Abetti, P. A. 1987. Start – up ventures: Towards the prediction of initial suc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 (3), 215–230.

[70] Thornton, R. A. , & Thompson, P. 2001.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An exploration of learning and spillovers in wartime shipbuild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50–1368.

[71] Tipple, G. 2005. The place of home-based enterprise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Evidence from Cochabamba, New Delhi, Surabaya and Pretoria. *Urban Studies*, 42 (4), 611–632.

[72] Ucbasaran, D., Flores, M., & Westhead, P. 2007. Entrepreneurial optimism and experience: Does the nature of experience matter?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7 (6), 1–15.

[73] Ucbasaran, D., Westhead, P., Wright, M., & Binks, M. 2009. Does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influence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 7 (1), 7–14.

[74] Viswanathan, M., Sridharan, S., Ritchie, R., & Jung, K. 2012. Marketing interactions in subsistence marketplaces: A bottom-up approach to designing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31 (2), 159–177.

[75] Webb, J. W., Bruton, G. D., & Tihanyi, L., Ireland, R. D. 2013.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Framing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5), 598–614.

[76] Webb, J. W., Pryor, C. G., & Kellermanns, F. W. 2015. Household enterprise in base-of-the-pyramid market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s and family embeddedness. *Africa Journal of Management*, 1 (2), 115–136.

[77] Webb, J. W., Tihanyi, L., Ireland, R. D., & Sirmon, D. G. 2009. You say illegal, I say legitim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 (3), 492–510.

[78] Westhead, P., Ucbasaran, D., & Wright, M. 2005. Decisions, actions, and performance: Do novice, serial, and portfolio entrepreneurs differ?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3 (4), 393–417.

[79] Westhead, P., & Wright, M. 1998. Novice,

portfolio, and serial founders: Are they differ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3 (3), 173–204.

[80] Williams, C. C., Martinez Perez, A., & Kedir, A. M. 2016.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impacts of starting up unregistered on firm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41 (1), 1–27.

[81] Williams, C. C., & Nadin, S. 2010.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15 (4), 361–378.

[82] 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83] Yu, X., Meng, X., Chen, Y., Chen, Y., & Bang, N. 2017. Work-family conflict,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new venture legitimacy in emerging economi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doi: 10.1016/j.techfore.2017.10.003.

[84] Zhang, C., Tan, J., & Tan, D. 2016. Fit by adaptation or fit by foun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isting and new entrepreneurial cohorts in 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5), 911–931.

[85] Zhang, Y., & Li, H. 2010. Innovation search of new ventures in a technology cluster: The role of ties with service intermediar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1), 88–109.

[86] Zhang, Y., & Rajagopalan, N. 2010. Once an outsider, always an outsider? CEO origin, strategic change, and firm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3), 334–346.

[87] Zhang, Y., Yang, J., Tang, J., Au, K., & Xue, H. 2013. Prior experience and social class as moderators of the planning-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in China's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7 (3), 214–229.